

# “德育” “智育” “体育” 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形成考论

张小丽

摘要：“德育”“智育”“体育”是目前中国教育领域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组概念。20世纪初，这组概念成为官方、民间乃至学界奉行的“公理”。其流行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这组概念并非来自斯宾塞，严复的《原强(修订稿)》并未明确提出“德育、智育、体育”的概念。其在中国的流行和传播更多是受日本兴学经验的影响。“德育、智育、体育”作为“日语借词”进入中文后，在严修、张謇、张之洞等人的推介下，成为国人熟悉的教育“术语”。与各种影响因素相应，20世纪初，三育论不仅成为“强国”的重要一环，也是国人理解、议论、分析教育问题的理论工具，还是实施教育的方法。

关键词：德育；智育；体育；严复；斯宾塞

“德育、智育、体育”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教育领域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组概念，承担着多种“职责”，是教育的构成成分，是教育学基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教育方针，也是实际教育工作的分工标准。“德育、智育、体育”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中也是我国现代教育思想得以运行的语言基础和社会化的必然依托。如此重要的一组概念，在中国到底是如何萌发、演变并开始流行的，迄今学界并无公论。

综观清末的教育类文献，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德育、智育、体育”频繁出现在各类人物在各种场合的论述中。如，1897年南洋公学学生编辑蒙学课本时，曾经介绍“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sup>[1]</sup>1901年之后，南洋公学《蒙学课本》第三次排印时，出版广告中也已宣称其“以德育、智育、体育为纲略。”（《南洋公学师范院编译图籍广告》，《统合新教授法》卷末附）。王国维1903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到，“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1904年严修考察日本“一桥附属小学看习字和游戏”时，赞叹“此等游戏非但注重体育而已，实兼德智两育也”；<sup>[2]</sup>164-165日本教习对中国公众的演说，以教育分为德育、智育、体育的三分法为公论；报刊中发有直接以“德育、智育、体育”为题的小文，如《妇女缠足于德育、智育、体育全有妨害》<sup>[3]</sup>《德育、智育、体育论》<sup>[4]</sup>等。这意味着，20世纪初，在中国“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论已经获得了不证自明的“公理”地位。在西方教育学在中国尚未大行其事的时代，“德育、智育、体育”在中国到底始于何时，受哪些因素影响得以如此流行，都是有待澄清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试图置身于历史事实，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探究这一组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境遇。

## 一、斯宾塞《教育论》在中国的引介

西方近代德、智、体的思想并非源于斯宾塞,就其思想渊源而论,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1905年,陕西高等学堂学生尹钧在习作《德育、智育、体育论》中,便认为三育分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他在文中提到:“西儒之讲教育者,以亚利斯托尔(即亚里士多德)为巨子,尝分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学期”,毛塔耶尼氏(Michel de Montaigne, 现译蒙田)认为“徒积知识无益实际,其教育之宗旨在启发德育、才力,熏以德育置于教育之最先”,而斯宾塞尔(即斯宾塞)“则注意物理,有偏重智育而轻德育之风”。[4]现在也有学者提出,西方近代“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并非始于斯宾塞,而是洛克等许多教育家的共同主张,但当斯宾塞将其论述三育的几篇文章合编成《教育论》(Education)一书出版时,的确反映出他本人提倡“三育并举”的教育观点。因此,斯宾塞虽非西方近代“三育并举”教育思想的始作俑者,但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其集大成者。[5]

在中国,德育、智育、体育“三育论”是斯宾塞的主要教育思想,这一观点在民国时期或者更早就成为教育学者的共识。雷通群在1934年出版的《西洋教育通史》中提到斯宾塞派及其影响时提到:“现在中国的教育界,关于教育方法上分为智育、德育、体育等,是受斯宾塞的教育影响,亦犹管理、训练、教学等的分类,是受海尔巴脱的影响也。”[6]吴俊升在1935年出版的《德育原理》中提到:“在教育学中教育之三分法之确定,殆始于斯宾塞,彼尝著书名 Education: Intellectual, Moral and Physical”,“昔日之教育学,多循斯宾塞尔之旧法,分论三育”。[7]当代的教育学者,也大抵如此认为,“把教育划分为智育、德育和体育,大抵以斯宾塞为始作俑者”[8]82。

斯宾塞关于智育、德育、体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论》中,其中包括四篇论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智育》(Intellectual)、《德育》(Moral)、《体育》(Physical)。[9]斯宾塞提出“智育”“德育”“体育”,主导思想是提高科学在教育中的地位,确认智育的固有价值。他谈三育跟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目的理论有一定的渊源。裴斯泰洛齐宣称初等教育应“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照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既力求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三方面能力,相应地实施德育、智育与体育也属顺理成章,三育划分的意义大抵也限于此。但是,斯宾塞谈论智育、德育、体育,并不涉及学校教育,也没有对三育的划分提供什么理论依据。他的《教育论》是四篇论文的结集,其中未提及三育之间的关系。《德育》一文只论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未涉及学校中的德育。尽管如此,从那时起,三育的划分确成为教育思想的定式。[8]82-83

首先向国人介绍斯宾塞及 Education 的是时任圣约翰书院学监的颜永京。1882年,他以《肄业要览》为题翻译了《教育论》的第一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10]。当时“教育”一词并未流行,也未与 Education 对译,在中英文对照的序言中,他将 Education 译为“肄业”,相应的,书中并未出现智育、德育、体育的提法。

在中国介绍斯宾塞最著名的是严复。严复于1895年发表《原强(修订稿)》一文,其中以《明民论》为题介绍了斯宾塞的《教育论》中的几篇文章:“斯宾塞尔全书而外,杂著无虑数

十篇,而《明民论》、《劝学篇》二者为最著。《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劝学篇》者,勉人治群学之书也。其教人也,以濬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sup>[11]17</sup>中国“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而“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智、德力者存,违于智、德、力者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sup>[11]16-27</sup>斯宾塞所论德育、智育、体育的对象是初等教育体系中的儿童,而严复则将其推而广之到“民”,并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将民力、民智、民德放在事关国家强弱贫富治乱的地位。正值中国甲午战败,中国知识分子群情激奋,此文以民之智、德、力来解释一国盛衰进退的理论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为时人所信服,并且对以后有关国民教育的讨论影响很大。由此,之后流行的三育论可能与《原强(修订稿)》有着某种关联,但文中并没有明确德育、智育、体育的提法。严复介绍德智体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学校教育,而是揭示成为强国国民的基本条件,彼时严复本人自然也谈不上具有“三育”的思想。<sup>[12]140</sup>

1903年,严复在《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中的“教科分门”中,分别提到德育和体育,并未提智育。<sup>[11]128</sup>他明确见诸文字的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提法是1906年题为《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在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词)的文章中,提到“考五洲之历史,凡国种之灭绝,抑为他种所羈縻者,不出三事:必其种之寡弱而不能强立者也;必其种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终之必其种之恶劣,而四维不张者也。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分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三者并举,顾主教育者,则必审所当之时势而为之重轻”,并阐发智育重于体育、德育重于智育的观点。<sup>[11]166</sup>此时德育、智育、体育的三分法早已成为流行的教育话语。在这种情况下说“严复把教育分为德育、智育、体育三部分,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最早的”<sup>[13]</sup>,是不合适的。

还有的学者提出,“1922年胡毅用白话文重译出版了斯宾塞的《教育论》。从此,斯宾塞的智育、德育和体育的‘三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广为传播。”<sup>[14]184</sup>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三育”思想在中国已经得到大范围的传播——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斯宾塞。

## 二、来自日本的兴学经验

据《汉语外来词词典》的考证,“德育”“体育”都是日语借词。汉语的“德育”一词源自日语“德育” tokuiku;“体育”一词源自日语“体育” taiiku,乃意译自英语 physical culture。<sup>[15]</sup>虽然词典中并未收录“智育”一词,从清末的相关文献资料看,也应该是来自日语。

就目前资料,“德育”和“体育”最早的提法,应在1897年,康有为在康同璧的帮助下翻译整理的《日本书目志》中。在“教育门”的“道德修身学”一纲下,列有《德育方法案》《德育原论》《德育新论》《日本帝国德育新论》等;在“实地教育”一纲下,列有毛利仙太郎、神保涛次郎同著的《体育学》。<sup>[16]</sup>目前最早可见的将“德育、智育、体育”并列的资料,见于

1898年春,南洋公学学生编辑蒙学课本时,曾经介绍的“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sup>[1]541</sup>,从当时南洋公学仿照日本师范学堂设附属小学的举动看,也应与日本的兴学经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起,出现了超越教学的实用书籍范围,要求获得更加原理性、系统性认识的新动向。斯宾塞的著作在总括地研究教育与社会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有的日本学者所指出的,“19世纪后半叶,斯宾塞的思想在英国以外的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巨大反响,一时之间在两国知识界广为流行并居支配地位”<sup>[17]472</sup>。从1877年起,斯宾塞的著作在日本得到了大量、持久的传播,《教育论》有多个版本出现。《斯氏教育论》(1880年,尺振八译)、《标注斯氏教育学》和《标注斯氏教育论》(1886年,有贺长雄译)等大量著作被翻译介绍出来。通过斯宾塞的著作,许多知识阶层的日本人学到了社会进化论的观点。<sup>[17]472</sup>在此期间,日本应是以日语德育、智育、体育意译斯宾塞《教育论》中的Moral、Intellectual、Physical,并将德育、智育、体育的理论应用于学校教育,成为讨论教育问题的重要术语。

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之前,日本的自由民权派、国学派、儒学派、洋学派围绕德育、体育等问题发生过数次思想论战。<sup>[18]</sup>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古代重德而轻智,明治前期又强调智育,忽视德、体,他指出,“人生下来之后,必须体育、智育、德育同时加以注意”,主张总结历史经验,明辨教育历史中的精粗长短,把体育、智育、德育的均衡发展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宗旨。<sup>[14]447</sup>福泽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广泛认同。这一点反应在日本教习的日常演说中。1904年,日本教习内崛在山东教育研究公所月会演说,以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的消长为主线介绍日本明治以来教育沿革。“以教育论,我国是从智育入手,然偏于知识一边,而未讲及体育一道”,“其后渐知智育与体育相为表里,遂谋改良之道”;“尤有弊者,于体育之事既缺,而于德育尤缺。为世间一个人,并不独智识完具方为全完无缺,独立之国民,道德之教育万不可少。当时因求致用,学洋文洋语者,未免鱼目混珠,仁义道德不知为何物,能者转而教人,师生之间毫无一点情谊。为师者第知授人以技能;为弟子者仅以学技能起见,两无相关,只成一种买卖。如此等情,非教育之累可乎?惟近十年来,研究教育渐有所得,于德育一道尤再三致意,智育、德育、体育三者合一,庶几渐臻于完全之教育”。<sup>[19]</sup>也就是说,日本是在1890年之后,达成了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合一、均衡发展的共识。

作为小学教育法和国民教育法的“德育、智育、体育”,很快成为日本的兴学经验传到中国,并被中国大员广为接受。1899年,姚锡光在考察日本学校过程中,认为“日本教育之法盖分为三类,曰体育,曰德育,曰智育,故虽极之盲哑,推及女子,亦有体操,重体育也,言伦理、言修身在德育也,凡诸学科皆智育也”。<sup>[20]</sup>1902年,吴汝纶赴日考察学务,在与长尾慎太郎笔谈时,曾问:“正德利用厚生,实括东西学之大成。贵国维新以后,德育、智育、体育三事并重,近来智育、体育皆著成效,德育今与古孰若?”<sup>[21]368</sup>1902年10月严修在日本考察期间,日记中有“大隈伯论文明”一则:“余略问小学教育法,伯言,德育智育体育云云,亦所习闻。”

<sup>[2]103</sup>1902年10月,张之洞在其影响甚广的《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提到“考日本教

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sup>[22]</sup>。也就是说,在日本,学校教育分为德育、智育、体育三大端算是常识,并且,吴汝纶、严修、张謇和张之洞等清末兴学的中流砥柱对此并不陌生,亦将之归为日本经典的兴学经验而奉为圭臬。

### 三、国人对“德育”“智育”“体育”的认识

#### (一)承接“我前事之师”的“德育”“智育”“体育”

虽然自古以来中国并没有所谓的“德育”“智育”“体育”等词。但就三育的实质内容德、智、体来看,远在上古,儒家施教育六大项目礼、乐、射、御、书、数的性质,恰恰完全包含三育宗旨。礼、乐是培养德性,射、御是锻炼体魄,书、数是教导智能。西汉戴德纂的《大戴礼记·保傅》中有云:“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sup>[23]</sup>三公之职,即在分掌太子的德、智、体三育。清末时国人亦认同,“夫我中国德育之说,则固自邃古以降,范围曲成,世守其法,不敢变而号为地球道德教育之正宗。然智与体之宗旨,孔子亦尝发明之。有勇知方,则体育实功也;博文约礼,则智育极诣也”。<sup>[4]</sup>

虽然如此,我们仍不能勉强说德、智、体三育是创自中国古代,只能就实在情形说,中国古代教育项目的六艺完全符合三育的内容。也许是由于古代的“思想铺垫”,到了近代,中国人对于介绍进来的德智体观念与其意旨范畴,是普遍接受而没有任何排拒的,<sup>[12]</sup>认为是“礼失求野”,并自觉以三育思想来比附、裁断传统典籍。1903年7月,在科举考试经济特科的试题中,有这样一道题目:“《大戴礼》: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与近世各国学校德育、体育、智育同义论。”<sup>[24]</sup>由此可见,国人对从日语中借来的“德育”“智育”“体育”颇愿领神会,欣然接受,并以之比附“我前事之师”。

#### (二)用以塑造国民的“德育”“智育”“体育”

严复借斯宾塞以民之智、德、力来解释一国盛衰进退的理论对1901年之后的教育议论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虽未有“德育”“智育”“体育”的提法,但他的分法,一方面为国人接受德、智、体的说法提供了支持与呼应,另一方面,自从国人接受中文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后,自动将严复民智、民德、民力的塑造归于智育、德育、体育,并加以发扬。

1902年,蔡锷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军国民篇》的著名政论文,其中提到“严子之《原强》,于国民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中,尤注重体育一端。当时读之,不过谓新议奇章,及进而详窥宇内大势,静究世界各国盛衰之由,身历其文明之地,而后知严子之眼光异于常人,而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sup>[25]</sup>并且,凡议及“教育”如何为“强国”作贡献的文章,其逻辑思路都多多少少受《原强》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1906年初《大公报》刊登的一篇题为《强国之本体何在?》的论说:

有国家即有竞争,由竞争即有强弱。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此天演之公例,莫能或逃者也。强国之道不外立宪法、开议院、复民权。而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学,学之美恶、教育之优劣

基之焉。夫所谓教育者，涵有德育、体育、智育三端，故欲国民之高尚，国力之强盛，非于民智、民体、民德三者求之不可。<sup>[26]</sup>

强国之根本果何在？曰在于优美之教育是也。教育者，实一国政治风俗之元素也，具经天纬地参赞化育之功。……今我执政当权诸公不欲国强则已，果欲国强，则必须宏布教育，广铸国民。划除其劣根性，培植其新道德，务使通国之人皆具真实技能、勇毅气魄。如以上所谓智体德三者之教育兼备，始可庶物振兴，百废俱举，共登二十世纪之舞台也。<sup>[27]</sup>

文章以进化论的眼光，将“德育、智育、体育”置于“强国—强民—强智、体、德—智育、体育、德育”的竞争链条中。文章落款为“惠如女士”——女士尚且于德育、智育、体育对一国兴衰成败的感念至此，三育的普及程度可见一斑。

由此，用于“强国”的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论普及之后，与严复所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殊途同归，共同为国人提供了由教育到“强国”的逻辑链条。

### (三) 作为学校教育法的“德育、智育、体育”

与来自日本的兴学经验相对应，国人每论及具体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小学教育，“德育、智育、体育”也是很理所当然的切入口。1901年，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教育家之康南海》中回忆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学，“其为教也，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在按照《长兴学记》的“纲领旨趣”制作的“学表”里，他将当年长兴学舍“学纲”的18项课程分别归纳称为德育、智育、体育三类，很理所当然地用三育论分析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课程设置，<sup>[28]64-65</sup>用以凸显康有为教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这两个学制章程，均吸收了日本经验，将学校教育分为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但在重要性方面，强调附带着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德育”重于其他二育。“中国圣经垂训以伦理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外国学堂于智育体育外，尤重德育，中外无二理也。<sup>[29]128, 209</sup>

1904年，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堂歌》，第一段即阐发“德育—智育—体育”的要旨，刊印一万五千份，颁发至各学堂，令学生“熟读歌唱，以资感发”，务须人给一纸，不可遗漏。其歌唱曰：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  
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  
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  
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  
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  
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sup>[30]</sup>

张謇亦十分信服三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1902年开办的通州师范学校教员室里，悬有“求于五州合智育体育，愿为诸子得经师人师”的对联，<sup>[31]</sup>1904年他在为扶海垞家塾拟定的章程中指出：“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基于蒙养，而尤在就儿童所已知，振起其受教育之兴

味,使之易晓而直觉”。<sup>[32]</sup>

基于梁启超、张之洞、张謇等人的宣扬,加之《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度保障,“德育、智育、体育”的三分法,俨然成为办理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法。1904年,《东抚周中丞蒙学简要教条三则》亦是以“东西各国学校德育与智育、体育并重”为依据,分“立德育之基”“立体育之基”“立智育之基”三则,引证古今中外先贤对蒙养教育提出建议。<sup>[33]</sup>另有论者在讲求普及教育法时设想如何落实三育论:“普及教育之方法:德智体三育,有分教法,有合教法。合教即广设小学堂,是分教则随时演讲,勉人以公私之道德,略似西人讲教。中国乡约是德育也;设立体育会,练身体习兵操是体育也;设半日学堂或夜学堂教授应用之国文、书算以便作工子弟乘间学习是智育也。”<sup>[34]</sup>即便论证强调某一育的重要性,也必以学校教育的三育分法为前提。1904年12月28日《大公报》有《论体育》一文,开篇提出“教育之方法有三,曰智育、德育、体育。体育者,智育德育之基础也”。

以上种种表明,20世纪初,国内知识阶层已经形成以下共识:“所谓教育者,必体育、智育及德育三者兼备,然后谓之为完全教育,三者缺一,则教育之义有未圆。”<sup>[35]</sup>

#### (四)进入教科书的“德育”“智育”“体育”

1904年,德育、智育作为教育学课程的主要内容被写入《奏定师范学堂章程》,成为后来规范教育学内容的主要依据:“教育原理,当讲明心理学之大要,及中国现在教育之宗旨,及德育智育之要义,并讲辨学(日本名论理学)及教授法之大要。”<sup>[29]329</sup>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教育学界多崇尚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许多教育学研究者把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融入自己的教育学著述中。清末国人所翻译的教育学讲义、教科书大多都是赫尔巴特教育学的“目的一手段”模式的思路,<sup>[36]</sup>极少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体系。偶有教科书单论各育,如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国人引进的第一本教育学的全译本),第二编为“教育之原质”,共三章,体育;智育;实际教育。<sup>[37]</sup>涉及体育、智育,却未及德育。亦有教科书兼论教育,包含此三育,如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官书局出版的《培氏实践教育学》(“培氏”系奥地利教育学家 Lind-ner, Gustav Adolf, 现译为林德纳),像陈黻宸在序中所言:“培氏此书列篇凡六首,二篇论体育,三篇论智育,四篇论情育美育,五篇论德育,六篇论教育通则,而于智育、情育、美育三者反覆指陈,而恐其为德累,则培氏又注重德育者也。”<sup>[38]</sup>这两种情况并不多见,其影响也远不如三育论。

1906年3月,学部咨文各省,“本部拟将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及教授法参考书等详加审定,择其善者颁发各省,以便画一学制。凡书肆已印成之本及私家编辑稿本均可随时邮寄本部呈请审定”,<sup>[39]</sup>建立教科书审查制度。而“教育学我国向无专家教科之书,亦无审定颁行之本”<sup>[40]</sup>,所以,教育学教科书的审查,除了《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审查人员认定的“公论”就显得极为重要。1910年,《学部官报》发布《商务印书馆经理候选道夏瑞芳呈初级师范学校教科书教育学等四种俟改后再呈审定批》:“查初级师范学校教科书《教育学》所论甚是,唯直译东文处,词句多欠修饰,应加删改。又自来教育学家多分体育、心育为二大部,心育中更别为德育、智育两门,故亦有分养护、训练、教授为三者。唯海尔巴特派之学说,不言体育。此

书于体育未一言及,或即本之海氏。然为普通参考或教科书起见,自以兼言三育为宜”,“俟改正后再呈审定”。<sup>[41]</sup>商务印书馆的这本初级师范学堂教育学教科书,应为吉田熊次著、蒋维乔译的《新教育学》。这时学部对于教育学教科书中应讲授的内容的评判,已经不单单是以《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规定去规范,而有了学理依据,对教育学说的流派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学部以体育、德育、智育的三分法为正宗,以“养护”“训练”“教授”能与其对应而给予“合法地位”。

至此,德育、智育、体育三育论在中国已经获得了在官方、民间乃至学界毋庸置疑的“公理”地位。

#### 四、结语

以目前学界的公论,德育、智育、体育三育思想源于斯宾塞,同时默认中国德育、智育、体育是通过严复译自斯宾塞。事实上,19世纪下半期,斯宾塞的教育思想在日本、美国都有很大影响,中国接受德育、智育、体育的途径,并不是唯一的,这一组概念在中国大行其是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教育中有类似德、智、体的分野;1895年以来,斯宾塞的教育思想经由严复的《原强(修订稿)》被释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爆得大名,影响了一大批国人;戊戌时期,中日的教育交往频繁,以“德育、智育、体育”对应斯宾塞教育思想的单词,作为“日语借词”进入中文;戊戌之后,随着中国对日考察的增多,德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分法作为日本重要的兴学经验被中国知识阶层奉为圭臬,频繁出现在严修、张謇、张之洞等兴学大员的公文、奏折和章程中,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教育“术语”。“术语”流行后,又反过来整合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借助于《原强》的逻辑思路,将德育、智育、体育置于强国强民的基础地位,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以及后来的教科书审查制度,则完成了德育、智育、体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制度化、权威化的过程。

与上述各种因素相应,20世纪初国人对德育、智育、体育理解和使用比较复杂。用德育、智育、体育论说教育问题的人,并不见得读过斯宾塞或对教育理论有什么深刻的了解,这么说、这么用的人,可能是读过斯宾塞,可能是直接受日本兴学经验影响,可能是真心以为是“我前事之师”,可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不管其思想资源构成如何,在“救亡图存”的压力之下,“德育”“智育”“体育”以其字面意思凭个人理解流行于世,传播的人无论是深有所感或道听途说,都颇以为然,此六字便也逐渐成为国人言说教育问题的流行话语。于是,三育论不仅成为“强国”的一环,也是国人理解、议论、分析教育问题的理论工具,同时,还是实施教育的方法。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澄清,反而在实践中得到强化,直到今天。

中国近代以来流行的新概念、新名词,它们的含义,往往与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境、时代问题紧密相连,它们的流行,往往是蕴含其中的新意义、新内涵所带来的影响力的社会化。现在,如果仅仅从理论层面进行学理化的辨析,并不足以充分解读这些饱受古今中外影响的“老概念”。回到中国近代的社会历史情境、语境,方能读出其中独特的中国含义,建立中国的教育

学概念体系。

#### 参考文献:

- [1] 南洋公学蒙学课本二编编辑大意(1897)[M]//朱有瓛,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一辑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2] 严修.严修东游日记[M].武安隆,刘玉敏点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 [3] 妇女缠足于德育、智育、体育全有妨害[N].大公报,1904-11-02.
- [4] 尹钧.德育智育体育论[J].秦中官报,1905(5).
- [5] 肖朗.科教兴国的强音——斯宾塞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6).
- [6] 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312.
- [7] 吴俊升.德育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3.
- [8] 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9] 赫·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5.
- [10] 史本守.肄业要览[M].颜永京,译.上海:上海格致书室,1895.
- [11] 严复.严复集(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2]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13] 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16.
- [14] 滕大春,等.外国教育通史(第四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 [15] 刘正琰,等.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77,343.
- [16]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三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95,406.
- [17] 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现代教育学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
- [18] 王桂.日本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141-169.
- [19] 师范学堂日本内崛教习演说[N].大公报,1904-07-15.
- [20] 姚锡光.东瀛学校举略[M]//吕顺长.教育考察记(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14.
- [21] 吴汝纶.东游丛录[M]//吕顺长.教育考察记(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22] 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 [23] 戴德,纂,卢辩,注.大戴礼记[M].清重刻本.
- [24] 考试经济特科题[N].大公报,1903-07-12. [25] 曾业英.蔡松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3.
- [26] 强国之根本果何在?[N].大公报,1906-01-31.
- [27] 强国之根本果何在?续[N].大公报,1906-02-01.
- [28]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一)(饮冰室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64-65.
- [29] 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篇)[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 [30]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第六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4258.
- [31]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93.
- [32] 张怡祖.张季子九录(教育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1558.
- [33] 东抚周中丞蒙学简要教条三则[N].大公报,1904-04-27,1904-04-28.
- [34] 讲求普及教育法论[N].大公报,1906-12-02.
- [35] 体育杂感[J].大陆,1904(11).

- [36] 瞿葆奎. 教育学的探究[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426.
- [37] 立花铣三郎. 教育学[M]//王国维, 译. 教育丛书(初集). 上海:教育世界社, 1901.
- [38] 埵斯弗勒特力. 埵氏实践教育学[M]. 藤代祯, 辅译;中岛端, 重译;管学大臣, 审定. 北京:北京大学堂官书局, 1903.
- [39] 学部示文来津[N]. 大公报, 1906-03-10.
- [40] 咨覆两江总督宁属初级师范学堂学生仍须五年期满准毕业其第十学期应使实地练习以补从前所缺文[J]. 学部官报, 1909(131).
- [41] 商务印书馆经理候选道夏瑞芳呈初级师范学校教科书教育学等四种俟改后再呈审定批学部官报[J]. 学部官报, 1909(134).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Moral Education”,“Intellectual Education”and  
“Physical Education”in Modern China

ZHANG Xiao-li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Moral education,intellectual education,and physical education”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concep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In the early 1900s,these concepts became the“axiom”in the official,civil or academic fields in China.A variety of factors led to their popularity.They did not come from Spenser and Yan Fu who did not clearly stated“moral education,intellectual education,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Yuan Qiang”(the revised version).The prevalence and spread in China were more affected by Japan’s experience.“Moral education,intellectual education,and physical education”as“Japanese loanwords”became familiar educational terminology to the public after Yan Xiu,Zhang Jian,and Zhang Zhi-Dong’s introduction.Together with a variety of other factors,the theory of“moral education,intellectual education,and physical education”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had contributed to a“powerful” country.At the same time,they became the theoretical tools for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discuss and analyze educational issues.They are also the approaches to implementing education.

**Key words:**moral education;intellectu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Yan Fu;Spencer

转自《教育学报》2015年第6期